

□国家建设与社会治理

社会网络对流动人口就业的影响： 双重效应与地区差异

——基于同乡网络的检验*

周 皓 刘文博

[摘 要] 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微观数据和相关统计年鉴数据，使用分层广义线性模型考察了社会网络对流动人口就业的影响及其在地区间的作用差异的分析结果表明：社会网络通过规模效应和质量效应影响流动人口的就业状况。规模效应表现为流动人口所在社会网络的平均就业率越高，其自身越可能处于在业状态，进入第二产业工作；质量效应表现为，流动人口所在社会网络的平均职业地位越高，其自身越可能进入第三产业，从事地位更高的职业。社会网络对流动人口就业的影响因地区就业环境而异，质量效应受就业环境的影响更强。因此，应辩证地看待社会网络对流动人口就业的影响，在关注其便利性的同时，也注意其对流动人口职业发展的束缚。

[关键词] 流动人口；就业状态；就业质量；社会网络；同乡网络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2JJD840001）；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24SHC004）

[收稿日期] 2024-12-23

[DOI] 10.15939/j.jujss.2025.04.sh1

[作者简介] 周 皓，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法学博士（北京 100871）；**[通讯作者]** 刘文博，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哈尔滨 150001）。

一、引 言

流动人口的就业问题一直受到学界的关注和重视。就业是民生之本，对流动人口而言，就业既是其流动的原因，也是在流入地居留的目的，还是其实现社会融合的基础。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剧、劳动力人口比例下降，以劳动年龄为主体的流动人口逐渐成为影响地区劳动力供给的关键。在这一背景下，对流动人口就业状况及影响因素的考察不仅能揭示其生存状态，也有助于探索劳动力要素合理有序流动的途径。

目前，流动人口就业研究以调查数据为基础，从多个维度较为全面地考察了流动人口的就业

* 文章中数据主要来自对国家统计局-北京大学数据开发中心微观数据集的样本数据加工处理；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国家统计局-北京大学数据开发中心和国家统计局的观点。感谢北京大学潘可曼和雷琳旋同学对本文数据分析工作的贡献，文责自负。

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其中，社会学视角下的社会资本是影响流动人口就业的重要因素之一。对于人力资本相对匮乏的流动人口（尤其是农民工）而言，社会资本往往起到更为关键的作用：在以差序格局为基本关系结构的中国社会，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的社会网络，作为社会资本的重要内容之一，不仅能够帮助流动人口决定流入地的选择^[1-2]，还能帮助他们获取就业信息、降低就业成本、维护合法权益，也有益于其自身更加全面地发展^[3]。然而，已有研究在考察社会网络对流动人口的就业效应时，却大多忽略了社会网络成员的就业状况（规模与质量）对流动人口就业各方面的影响，既未能充分讨论中国情境之下社会网络对流动人口职业层级的禁锢，也未能充分解释社会网络对流动人口就业的影响途径，还忽视了由于不同地区劳动力市场发育水平和就业环境等宏观因素差异而导致的社会网络的异质性影响作用。

不论是在数据（样本结构）与测量方面，还是在分析方法与研究问题等方面，现有的流动人口就业研究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在数据层面，虽然有部分研究使用了人口普查或小普查数据，但多数研究通常以流动人口监测调查为代表的各类调查数据为基础。由于调查目的和抽样过程等环节的不同，各调查的样本结构可能存在较大的差异，从而可能导致统计结果的样本结构性偏差^[4]，进而影响分析结果与研究结论。在方法层面，有的研究将地区与个体这两个不同层级的变量视为同一层级的变量而加入模型中，从而导致可能的统计偏误。此外，流动人口统计口径的不同导致研究对象的差异，因果关系的倒置，乃至部分关键变量（如社会资本、就业质量等）操作化定义不同等各种问题，使得多数研究之间缺乏可比性。分析结果与研究结论的不一致无益于理解现实社会、检验相关理论。这也正是本文将利用人口普查数据、结合适当的统计方法和统计口径进行分析与讨论的目的所在。

为此，本文利用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微观数据，以流量流动人口为研究对象，结合相关统计年鉴数据，利用分层广义线性模型，从网络成员就业的规模和质量两个维度考察流动人口的社会网络^①对流动人口就业的影响，检验了网络效应的地区差异，以回答以下三个问题：其一，流动人口社会网络中成员的就业水平是否会显著影响其就业状态；其二，流动人口社会网络中成员的就业质量是否会显著影响其就业质量；其三，社会网络的影响作用是否会因流入地就业市场的不同而存在差异。这三个问题分别对应着本文的边际贡献：数据代表性的改进、社会网络的就业效应分解，社会网络影响作用的异质性分析。

二、流动人口就业研究综述

流动人口就业研究主要是以调查数据为基础（如以流动人口监测调查为代表的各类相关调查），考察与流动相关的各种特征（如流动时间、个体特征和社会网络等）对就业状况（包括就业状态（失业）、就业稳定性、就业质量等方面）的影响作用，以及将就业状况作为原因讨论其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等后果的影响。结合研究目标，本文将从就业状况、影响因素、社会网络与流动人口就业这三个方面予以总结。

（一）流动人口的就业状况

已有研究从就业身份、行业类型、就业质量等方面对流动人口的就业状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

① 本文中“社会网络”概念限于“同乡网络”。一方面，对流动人口而言，“同乡网络”是重要的社会网络类型之一，多数研究均从“同乡网络”维度考察其社会网络状况；另一方面，普查数据限制了其他类型社会网络的测量。基于学界惯例和研究对话需要，本文在行文中统一使用“社会网络”表述。

考察,发现流动人口的就业身份以雇员和自雇为主^[5-6];行业类型以服务业为主,制造业次之,主要从事技术含量低、劳动强度大的传统行业^[5,7];在就业质量方面,流动人口的就业质量整体处于中下等水平^[8],且显著低于本地户籍人口^[9],就业的稳定性总体不高^[10],签订劳动合同,特别是长期合同的比例偏低^[11]。尽管流动人口的失业率低于本地户籍人口^[12],但其失业问题已在近年间逐渐显现,并有持续增长的趋势^[13]。

(二) 流动人口就业的影响因素

对于流动人口就业的影响因素,已有研究经历了从仅关注个体因素,到考察个体因素时控制地域因素,再到同时考察个体和地域因素的转变。

在个体层面,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是影响流动人口就业的关键因素^[14-15],人力资本中的受教育程度和技能水平能够显著正向影响其就业质量^[15],社会资本的作用则并不稳健。户籍身份^[7,16]、流动范围^[8]、随迁规模^[17]、在流入地的居住时间长度^[13]等也会显著影响流动人口的就业水平,而且社会资本对于男性和女性的就业质量存在异质性影响作用^[18]。

在地域层面,流入地城市的产业结构与流动人口的行业类型存在正相关关系^[7,19],流入地的工资水平对流动人口的就业质量有显著正向影响^[20],劳动力市场中的城乡和区域分割则使外来的流动人口处于不利地位^[21]。

(三) 社会网络与流动人口就业

自格兰诺维特^[22]提出“弱关系优势”以来,社会网络逐渐成为就业研究中的关键因素。普特南^[23]、林南^[24]、边燕杰^[25]等国内外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阐述了社会网络对就业的影响。在移民研究中,社会网络是一系列基于亲属、友谊及同乡关系的人际纽带。^[26]已有研究对社会网络与移民就业关系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求职过程和就业结果两个方面。

社会网络在移民求职过程中是一个重要的资源-机会结构。在迁入初期,由于缺乏当地的工作经验和语言技能,移民往往十分依赖社会网络的作用^[27],社会网络通过传递就业信息、进行内部推荐等方式来降低就业搜索成本,帮助新移民获得工作^[3,28],在促进移民就业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29][12][30]}。在我国,多数农民工都是通过社会网络中的强关系实现就业的。^[31-32]在国外,新近的研究则发现,对于低技能移民来说,市场化的求职机构(如职业介绍所和媒体)正在发挥比移民网络更重要的作用。^[33-34]

在就业质量方面,既有研究在社会网络对移民就业的影响方向上存在争议。国外学者发现,除了提供就业机会,社会网络对移民就业的影响还在于促进彼此间的合作。^[35]新移民通常会跟随他们的同胞在相同的职业中工作^[28],并逐渐形成“移民利基市场”(immigrant niches)^[36]或“族裔飞地”(ethnic enclaves)^[37]。这种通过社会网络聚集起来的族裔经济提高了移民的工资水平,形成了工资溢价。^[28]但也有学者指出,这种聚集性就业尽管可以缓解迁移初期的压力,却也使移民被紧密地包裹在以同族人为基础的社会网络中,失去与网络外建立弱关系的优势。^[38]因此,虽然社会网络能够帮助移民在当地站稳脚跟,但它们也作为约束因素,将移民限制在低声望的职业中。^[27]相比之下,通过市场机构找到工作的移民更了解市场的工资水平,也更有能力与雇主谈判,其工资增长明显高于通过社会网络找到工作的移民。^[33]

国内学者发现,社会网络,尤其是企业内的同乡网络能够为流动人口提供更多资源、帮助和保护,对其工资水平有显著的提升作用。^[39-40]但也有研究认为,以同乡和朋友为主的社会网络对流动人口工资的影响有限,不能发挥显著作用^[41-42],且由于流动人口的社会网络种类单一、同质化严重,容易导致其就业固化在低级、简单的岗位上,反而制约就业质量的提升^[3,43]。

(四) 文献评述

已有研究讨论了我国流动人口就业问题以及社会网络与流动人口就业间的关系，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但仍然有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讨论。

1. 数据问题

虽有部分研究使用人口普查数据讨论流动人口的就业率或失业率问题^[13] 和社会网络对流动人口流入地选择的影响问题^[1-2,44]，但是多数研究在分析时使用的都是调查数据。不可否认，包含有更多变量的社会调查能够为研究提供充分的信息，但是不论失业率，还是社会网络与就业的关系，都涉及样本的代表性及样本的结构偏差问题。不论采取何种统计方法，都可能由于样本结构的偏离而导致结果的偏差。^[4] 只有具有更好代表性的数据，才有可能更加准确地揭示真实的变量关系。但已有各大型社会调查都可能存在一定的结构性偏离，这也是导致不同研究的结果之间存在差异甚至相悖的重要原因之一。

2. 测量问题

测量是社会科学中的重要基础性工作之一，测量的准确性直接涉及分析结果及其结论的准确性。不论就业和社会网络这种具有经济学与社会学含义的概念，还是流动人口这一基础性概念，都会由于测量（与其定义或统计口径相关）而带来偏差。以流动人口为例，不同的统计口径（测量标准）得到不同的流动人口群体^[45-46]，进而得到不同的样本结构及所代表的总体，以及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如5年前常住地口径之下的流动人口具有样本混合属性^[45]；户籍口径下的流动人口则可能被划分为流量与存量流动人口，分别对应着不同时期流动的群体^[46]。因此，即使是人口普查，除了解决代表性问题以外，还存在统计口径（测量）问题。以往研究通常以各大型社会调查中的流动人口为研究对象，但各调查中对流动人口的定义各不相同，从而也会得到完全不同的样本特征，并代表着不同的研究总体。不论是由于异质性效应，还是由于群体差异性，都会因所代表的总体之不同而得到不同的统计结果与研究结论。再以社会网络为例，部分大型社会调查可能会包含有关社会网络的具体问题，但由于其研究设计人员对社会网络的不同理解、各调查的研究目标甚至各调查对类似问题的不同提问方式（包括题干与选项）等原因，对社会网络的测量都会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从而使分析结果各不相同甚至相悖。因此，测量问题同样也是一个被忽视的可能误差。

3. 因果关系倒置问题

迁移研究中最难解决的问题就是迁移决策的因果机制问题。有些移民受迫于迁出地的生存压力而选择迁出，他们在迁移决策之时并未能在迁入地找到工作或落脚点；而迁入地的社会网络则在其进入迁入地以后才开始为其提供信息。而有些移民却是因为在迁移决策之前就有社会网络支持（不仅信息，还包括居住地点和工作等）才决定迁移。因此，在上述两种情况下，社会网络与迁移决策间可能存在着不同的因果关系。即到底是因为迁移而去就业，还是因为就业才要迁移，现实研究中很难区分孰因孰果，也就无法进行更为深入的讨论。而就业与就业质量（就业的后续问题）、社会网络和就业质量间的因果关系亦是类似。因此，在实证研究中更应该注意到这种可能的因果关系倒置问题。

4. 地区（或社区）层级变量的作用问题

社会网络作为劳动力市场中的非正式资源，其作用可能会受制于当地劳动力市场的发育水平，具有不同就业水平的地区隐含着不同的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进而使社会网络的就业效应对流动人口的就业产生不同作用。虽然部分研究也考虑了流入地的市场环境，但未能充分讨论两个关系性的事实问题是：其一，流入地地区层级的市场环境变量如何通过个体特征而影响其就

业状况；其二，流入地的这些特征变量是否会对社会网络对流动人口就业的影响产生调节作用。与此相关的方法问题是，若将地区层级的变量与个体层级的变量置于同等地位纳入模型之中，可能会导致分析结果的偏误。^{[47]102} 因此，方法上看，如果要考虑地区层级的变量，最好的方法是使用分层线性模型（HLM）。

5. 社会网络的成员特征

已有研究多从网络规模、关系强弱、同质性与异质性等方面切入来讨论社会网络的作用，其潜在的假定是：社会网络能够影响流动人口就业，网络的结构特征及流动人口与网络连结的紧密程度将影响其获取就业资源的多寡。然而，除了这些因素以外，社会网络成员的就业特征（如就业状态和就业质量）同样可能会显著地影响流动人口的就业特征。若忽略社会网络成员的特征而只就网络结构而谈社会网络，其最终结果可能无法真正反映社会网络的作用。

基于上述研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本文拟采用更具全国代表性的人口普查数据展开研究，尝试对相关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讨论。

（五）研究假设

根据已有研究，社会网络通过提供就业信息、进行内部推荐等方式影响流动人口求职，可以推测，社会网络能够有效传递就业信息、帮助个体就业关键在于网络成员的在业比例。在网络异质性较强的情况下，处于在业状态的成员比例越高，越可能传递更丰富的就业信息，提高个体找到工作的概率；在网络同质性较高的情况下，在业成员比例越高，越容易形成聚集性就业，产生就业吸纳作用。因此，无论通过哪种路径，社会网络对流动个体就业的影响都依赖于成员的在业比例。可以将这种效应称为网络的规模效应，即：

假设 1：社会网络的平均就业率对流动人口的就业状态有显著正向影响，网络平均就业率越高，流动人口越可能处于在业状态。

除了求职过程，社会网络还影响流动人口的就业结果。已有研究从关系资源同质性的角度阐述了社会网络对流动人口就业的影响，或认为聚集性的移民经济能带来工资溢价，或认为其制约了移民就业质量的提升。本文以为，单纯从资源同质性的角度无法识别网络作用的方向，决定网络作用方向的关键在于网络成员的整体就业水平，当整体就业水平较高时，社会网络更易带动个体进入到地位更高的职业，反之则可能将个体束缚在较低水平的就业环境中。这种效应可以被称为网络的质量效应，即：

假设 2：社会网络的平均职业地位对流动人口的就业质量有显著正向影响，网络平均职业地位越高，流动人口越可能进入更高地位的职业。

此外，本文还尝试关注社会网络的就业效应在地区层面的作用差异。流动人口是嵌入在就业市场中的^[7]，流入地就业市场的发育水平不仅会直接影响个体的就业状况，还可能通过个体属性间接塑造其就业特征。社会网络作为一种非正式的就业资源，其作用范围和强度并无统一性规范，而很可能随流入地就业市场状况而异。即：

假设 3：社会网络对流动人口就业的影响因流入地就业市场状况而异。

三、数据、变量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包括个体和地区两部分。个体数据来自 2020 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七普”）微观数据。考虑到流量与存量流动人口间的差异，本文将选择 5 年内的流量流动

人口作为分析对象。依据人口普查标准,“5年内的流量流动人口”是指“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至五年以内,且户口所在地与现居住地跨乡镇街道不一致”的人。本文只考察在城镇就业问题,故筛选15—64岁劳动年龄的流量流动人口,排除在校学生,并在模型分析部分排除农业从业人员。

地区数据是根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6》整理的2015年全国各地市经济社会特征数据,共有289个完整的城市样本。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本文基于202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进行分析,但分析对象为流动时间在5年及以内的流量流动人口,考虑到因果关系的时间先后性,应选择2015年至2020年的初始时点,即2015年年末时点的社会经济指标作为解释变量,故使用2015年的城市特征变量。

结合个体数据和城市数据,剔除少量缺失案例,共得到151 005个案例作为分析样本。

(二) 变量测量

1. 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流动人口的就业状况,从就业状态(是否在业)、行业类型和职业地位三个维度进行测量:1) 就业状态。根据问题“10月25—31日是否为取得收入而工作了1小时以上”进行测量,将回答“是”和“在职休假、在职学习培训、临时停工”的人定义为“在业”(赋值为1),将回答“未做任何工作”的人定义为“失业”(赋值为0),并剔除其中因“丧失劳动能力”和“在校学习”而未工作的人;2) 行业类型。七普数据公布了劳动者的行业大类,将其分为农业、制造业、服务业三类,由于回归分析时剔除了农业从业人员,行业类型变量是一个“从事制造业”(赋值为0值)和“服务业”(赋值为1值)的“0—1”变量;3) 职业地位。对于职业类型,七普数据仅公布了1—7的职业大类代码,分别为:①企事业单位负责人;②专业技术人员;③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④商业服务业人员;⑤农林牧渔从业人员;⑥生产设备操作人员;⑦其他人员。本文剔除少量“其他人员”样本,并将样本量较少的“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和“专业技术人员”合并为“管理技术人员”,得到一个包含5个等级的职业地位变量,在分析时作为序次变量。

2. 核心自变量

本文的核心自变量是社会网络的平均就业状况,将从规模和质量两个维度测量。

首先应对流动人口的社会网络范围进行界定。Massey将移民的社会网络定义为“通过亲属、友谊和地缘将迁移者、前期迁移者以及迁出和迁入地中的非迁移者结合起来的人际关系集合。”^[26]在本文中,对于流动人口社会网络的考察主要聚焦于同乡网络,这是由于,一方面,同一原籍或来自同一地的迁移人口在就业和社会交往上聚集的现象由来已久^[39],同乡网络既是影响流动人口流入地选择的关键^[2],也是迁移流得以持续的重要原因^[44];另一方面,同乡网络也是影响流动人口就业的关键因素,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后多是以同乡关系为基础建立和拓展社会网络,并以此求职和适应城市生活^[39]。因此,大量研究都通过同乡网络来考察流动人口的社会网络状况。^[2,39,44,48-49]

由于人口普查数据中没有针对社会网络的测量题目,本文在参考已有文献的基础上,将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社会网络界定为“在流入地中,与流动者来自同一流出地的人”。对跨省流动人口而言,社会网络包括在流入城市中与其来自同一省份的流动者,对省内跨县流动人口而言,社会网络包括在流入城市中与其来自同一个地市的流动者。尽管这种方式所界定的社会网络范围相对宽泛,但考虑到当下以地缘为纽带建立起的外来人口行业聚集现象日益普遍(如兰州拉面、沙县小吃等地方特色餐饮,湖南新化的文印产业等),这种测量方式具有其合理性;且已有大量

研究采用此种方式对流动人口的社会网络进行测量,并发现其对人口流量、流向、就业状况的显著影响^[2,39,44,48-49],亦佐证了此种方法的可行性。

在确定了社会网络范围后,根据网络成员的就业状态计算社会网络平均就业率以反映网络就业的规模特征,根据网络成员的职业地位计算社会网络平均职业地位以反映网络就业的质量特征。

除了社会网络,在跨层交互分析时,流入地的就业市场状况也是本文的关键自变量。本文将从城镇登记失业率和劳动力从业结构两个维度测量。其中,城镇登记失业率是城镇年末登记失业人数占年末从业人员总数与登记失业人数之和的比重;劳动力从业结构由年末城镇从业人员中从事第三产业的人口规模比上第二产业的人口规模得到。需要注意的是,两个指标都基于城镇本地人的就业状况计算得出,一方面为了考察城镇本地市场与外来流动人口就业的关系;另一方面则是为了避免分析时出现反向因果问题。^①

3. 控制变量

包括个体和地区两个层级。个体层级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城乡来源、流动范围;地区层级变量包括人口规模、地区生产总值、地区产业结构。其中,城乡来源根据“户口登记地类型”进行测量,将“镇的居委会”和“街道”定义为“城镇地区”,将“乡”和“镇的村委会”定义为“农村地区”。地区产业结构由第三产业产值比上第二产业产值得到。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1。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个体层面变量(N=151 005)					
就业状态(失业=0)	0.803	0.398	婚姻状况(未婚=0)		
所在行业(制造业=0)			已婚有配偶	0.591	0.492
服务业	0.593	0.491	离婚或丧偶	0.030	0.169
职业地位(农林牧渔从业人员=0)			流动范围(县内流动=0)		
生产操作人员	0.334	0.471	省内跨县流动	0.357	0.479
服务人员	0.421	0.494	跨省流动	0.290	0.454
办事人员	0.078	0.268			
管理技术人员	0.165	0.371	地区层面变量(N=289)		
性别(女性=0)	0.524	0.499	人口规模(亿人)	0.045	0.032
年龄	34.189	13.168	地区生产总值(千亿元)	2.480	3.263
城乡来源(农村=0)	0.318	0.466	城镇登记失业率(%)	2.620	1.762
受教育年限	11.695	3.366	地区产业结构	0.972	0.501
网络平均就业率	0.785	0.141	地区从业结构	1.392	0.992
网络平均职业地位	2.887	0.577			

注:表中个体数据只针对进入模型分析的 5 年内流量流动人口样本,虽已剔除行业类型为“农业”的样本,但仍有少量所属行业为非农业、职业类型为“农林业牧渔从业人员”的样本留存。

(三) 分析方法

为解决不同层级的变量在同一模型中可能导致的统计偏误问题,本文将使用分层广义线性模

① 若计算流入地就业市场状况时包含流动人口,在分析过程中就会出现自变量与因变量间的反向因果问题,即作为因变量的流动人口就业状况本身就影响作为自变量的流入地市场状况。仅基于城镇本地人的就业状况进行计算则可避免此问题。

型 (Hierarchical Generalized Linear Model)。它不仅可以区分不同层级各自的相对作用,还可以进一步揭示地区层级变量如何通过个体层级变量影响最终结果变量,因而既能考察社会网络对流动人口就业的净影响,也可考察流入地就业环境与社会网络对流动人口就业的交互影响,揭示社会网络就业效应的地区差异。

以就业状态模型为例,模型的因变量“就业状态”是一个服从伯努利分布的二分类变量,故选择 Logit 函数作为连结函数,模型的形式如下:

层一为个体层级模型:

$$n_{ij} = \log \left(\frac{\varphi_{ij}}{1 - \varphi_{ij}} \right) = \beta_{0j} + \sum \beta_{pj} x_{ij}$$

层二为地区层级模型:

$$\beta_{0j} = \gamma_{00} + \sum \gamma_{0q} w_j + u_{0j}$$

$$\beta_{pj} = \gamma_{p0}$$

组合模型为:

$$n_{ij} = \log \left(\frac{\varphi_{ij}}{1 - \varphi_{ij}} \right) = \gamma_{00} + \sum \gamma_{0q} w_j + \sum \gamma_{p0} x_{ij} + u_{0j}$$

其中, i 为流动人口个体, j 为所在地区, n_{ij} 为对数发生比, φ_{ij} 为地区 j 中个体 i 的就业概率, γ_{00} 为各地区就业率的总体均值, w_j 为各项地区特征变量, 包括人口规模、地区生产总值、产业结构、从业人员结构和城镇登记失业率, γ_{0q} 为第 q 个地区变量的作用系数, x_{ij} 为个体特征变量, 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城乡来源、流动范围、社会网络平均就业率和社会网络平均职业地位, γ_{p0} 为第 p 个个体变量的作用系数, u_{0j} 为地区层面的随机误差。

除了将地区特征作为截距项加入模型, 本文还将流入地就业状况作为斜率项加入模型, 考察社会网络与流入地就业市场状况的交互作用。此时, 层二的斜率模型如下:

$$\beta_{pj} = \gamma_{p0} + \gamma_{p1} market_j + u_{1j}$$

其中, $market_j$ 为流入地市场状况, 包括城镇登记失业率和劳动力从业结构, u_{1j} 为斜率层面的随机误差。文中的另外两个因变量, “行业类型”与“是否就业”的性质一致, 模型设置与上述模型完全一致。“职业地位”变量为序次变量, 使用分层 Ologit 模型进行分析, 自变量将采用相同的设置。

四、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将首先进行描述性分计, 然后在区分个体层级和地区层级变量的基础上, 利用分层模型考察社会网络特征 (规模特征和质量特征) 对流动人口就业状况 (包括就业状态、行业类型、职业地位) 的影响; 最后, 在上述模型的基础上加入社会网络与流入地就业环境的交互作用, 以考察社会网络的异质性作用及其作用途径。

(一) 描述性分析

本文首先从就业状态、行业类型、职业地位三个方面描述流动人口的就业状况, 并将其与本地户籍人口比较, 结果见表 2 和图 1。

在就业状态方面, 结果显示: 1) 流动人口中处于在业状态的人员比例较高, 不同属性的流动人口中均有 80% 左右的人处于在业状态, 高于本地户籍人口。在流动人口内部, 5 年内流量流

动人口的在业比例又高于 5 年以上的存量流动人口。这显现出明显的迁移选择性特征，即流动人口以就业为主要流动目标，通常在找到工作后才选择流出，因而比本地人口更可能处于在业状态；在流动人口内部，流动时间越短的人遭遇失业问题的可能性越低，因而 5 年内流动人口的在业比例更高。2) 从城乡属性上看，无论流动与否，城镇人口处于在业状态的比例均高于农村人口。这可能反映出城乡间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在我国的城镇劳动力市场中，存在以城乡来源为划分的市场分割现象，来自城镇的劳动者不仅更易找到工作，也更易进入首要劳动力市场，获得更加稳定的工作，因而其在业比例要高于来自农村的劳动者。

表 2 不同身份属性人群的就业状态与行业类型 (单位: %)

人口类型	就业状态			行业类型			
	在业	失业	合计	农业	制造业	服务业	合计
农村本地人口	74. 21	25. 79	100	46. 13	26. 68	27. 19	100
城镇本地人口	75. 25	24. 75	100	5. 26	24. 42	70. 32	100
5 年内农村流动人口	80. 65	19. 35	100	3. 52	44. 63	51. 85	100
5 年内城镇流动人口	80. 92	19. 08	100	1. 44	26. 37	72. 19	100
5 年以上农村流动人口	79. 55	20. 45	100	4. 24	41. 10	54. 65	100
5 年以上城镇流动人口	80. 66	19. 34	100	1. 72	24. 81	73. 47	100

在行业类型方面，结果显示：1) 在几类不同属性的流动人口中，从事服务业的比例均为最高，制造业次之，从事农业行业的比例则在 5% 以下，说明服务业是吸纳流动人口最多的行业。2) 将流动人口与本地户籍人口比较发现，除农村本地人从事农业的比例较高之外，其余几类人均呈现“服务业比例最高、制造业次之、农业比例极低”的行业分布，但不同人群中行业分布的比例存在差异：在城镇人口中，服务业比例占绝对主导，超过 70%，制造业比例仅为 25% 左右；而农村人口中，服务业比例占 50% 左右，制造业则为 40% 左右。这一方面显示出劳动力市场存在因城乡来源而划分的行业分异现象，另一方面也说明在城乡属性一致的情况下，流动人口与本地户籍人口的行业结构差别不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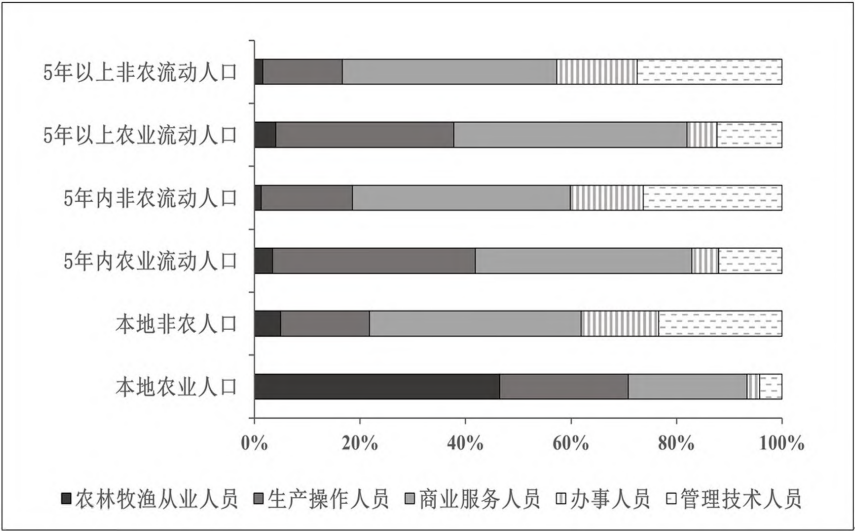


图 1 不同身份属性人群的职业分布

图1展示了流动人口与本地户籍人口的职业分布情况,结果显示:1)不同属性的流动人口中从事商业服务类职业的比例均最高,超过40%,其余几类职业的比例因城乡来源而异,来自农村的流动人口从事生产操作类职业的比例较高,但从事技术类、管理类职业的比例则相对较低;来自城镇的流动人口中,从事专业技术类职业的比例较高,从事生产操作类职业的比例则在20%以下。2)从流动时长来看,在城乡来源一致的情况下,5年以上流动人口从事较高地位职业(即管理、技术、办事类职业)的比例高于5年内流动人口,说明流动时间越长的流动者越可能进入地位相对较高的职业。3)从流动人口与本地户籍人口的对比来看,在职业分布中同样存在以城乡属性划分的结构差异,即无论本地人口还是流动人口,具有相同城乡属性的劳动者在职业结构上都很相似,这一方面可能源自不同人群的人力资本差距,另一方面则可能是由于劳动力市场的分割限制。

(二) 社会网络对流动人口就业的影响

在区分个体层级和地区层级变量的基础上,利用分层模型考察社会网络特征(包括规模特征和质量特征)对流动人口就业状况(包括就业状态、行业类型、职业地位)的影响。估计结果见表3。

1. 社会网络对流动人口就业状态的影响

在就业状态模型中,社会网络的规模效应和质量效应呈现出不同的作用模式。规模效应方面,社会网络的平均就业率对流动人口就业状态的影响显著为正,网络平均就业率越高,流动人口处于在业状态的发生比也越高,说明社会网络的确对网络成员发挥着就业带动作用。质量效应方面,社会网络的平均职业地位对流动人口就业状态的影响并不显著,说明社会网络的就业带动作用主要基于网络成员的在业比例而非平均就业层次的高低。

流入地就业市场的作用表现为:城镇登记失业率越高,流动人口处于在业状态的发生比越低,说明外来的流动人口并不会因本地失业的增多而获得更多就业机会。劳动力从业结构对就业状态的影响则并不显著。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影响表现为:来自城镇的流动人口处于在业状态的发生比显著低于来自农村的流动者,可能是因为农村流动者更能接受条件较差的工作,从而更易处于在业状态;跨省流动人口就业的发生比显著高于区县内流动者,可能是由于人口流动的就业选择性,即人们通常在确定能就业后才选择大范围流动。

表3 流动人口就业影响因素的分层模型

变量	就业状态	行业类型	职业地位
层一:个体变量			
男性(女性=0)	1.500*** (0.016)	-0.697*** (0.014)	-0.551*** (0.012)
年龄	-0.023*** (0.001)	-0.008*** (0.001)	0.000 (0.001)
婚姻状况(未婚=0)			
已婚	0.131*** (0.022)	-0.199*** (0.018)	-0.048** (0.016)
离婚或丧偶	0.195*** (0.044)	0.138** (0.044)	0.034 (0.036)
受教育年限	0.102*** (0.003)	0.096*** (0.002)	0.230*** (0.002)

表 3 流动人口就业影响因素的分层模型(续)

变量	就业状态	行业类型	职业地位
城乡来源(农村地区=0)	-0.049*** (0.018)	0.246*** (0.016)	0.176*** (0.014)
流动范围(区县内=0)			
省内跨县流动	0.007 (0.020)	-0.373*** (0.021)	-0.567*** (0.017)
跨省流动	0.048* (0.024)	-0.739*** (0.022)	-0.677*** (0.019)
网络平均就业率	6.112*** (0.077)	-0.980*** (0.072)	-0.732*** (0.061)
网络平均职业地位	-0.023 (0.018)	0.627*** (0.016)	1.148*** (0.014)
层二:地区变量			
人口规模	0.978* (0.445)	2.026* (0.859)	1.656** (0.547)
地区生产总值	-0.022*** (0.005)	-0.013 (0.009)	-0.025*** (0.006)
地区产业结构	-0.022 (0.035)	0.061 (0.060)	-0.047 (0.039)
城镇登记失业率	-0.025** (0.008)	0.038** (0.014)	0.018 (0.009)
劳动力从业结构	-0.028 (0.017)	0.123*** (0.029)	0.085*** (0.020)
常数项	-4.002*** (0.094)	-0.842*** (0.107)	— —
个体样本	151005	121876	121876
地区数	289	289	289
ICC	0.063	0.068	0.041

注: 1) *** p<0.001, ** p<0.01, * p<0.05; 2) 括号内为标准误; 3) 因篇幅所限, 此处不展示分层 Ologit 模型的多个截距值(门槛值)。下表同。

控制变量中, 在个体层面, 男性流动人口在业的发生比显著高于女性, 年龄越大的流动人口在业的发生比越低, 受教育年限越长的流动人口处于在业状态的发生比越高, 已婚和离婚丧偶的流动人口处于在业状态的发生比均显著高于未婚者。在地区层面, 人口规模对流动人口就业状态的影响显著为正, 地区生产总值却显著负向影响流动人口的就业状态, 这可能是由于城市劳动力市场对流动人口的排斥, 导致外来流动人口在经济发达地区的失业概率更高, 也更难找到新的工作。地区产业结构的影响则并不显著。

2. 社会网络对流动人口行业类型的影响

在行业类型模型中, 社会网络的规模效应和质量效应呈现出相反的作用方向。规模效应表现为, 社会网络的平均就业率越高, 流动人口越可能从事制造业而非服务业, 表明社会网络的就业带动作用主要体现在制造业上。质量效应表现为, 社会网络的平均职业地位越高, 流动人口越可能从事服务业而非制造业。由于流动人口在制造业中多从事技术含量低、体力要求高的工作, 服务业的工作条件则相对较好。当流动人口所在网络的职业层次越高时, 其自身更易被带入工作条

件相对更好的服务业中。

流入地就业市场方面，城镇登记失业率越高，流动人口越有可能从事服务业。可能是由于服务业具有较强的就业吸纳能力，在整体就业环境较差时，服务业成为流动人口就业的重要途径。劳动力从业结构与流动人口的行业类型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流动人口从事的行业符合当地的就业布局。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影响表现为：来自城镇的流动人口从事服务业的发生比显著高于来自农村的流动者，流动范围越广的人从事服务业的发生比越低。这反映出地方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分工——服务业更可能就近开放给本地人，而制造业则更倾向于招聘外来人口。

控制变量中，在个体层面，男性流动人口从事服务业的发生比显著低于女性，年龄越大的流动人口从事服务业的发生比越低，未婚流动人口从事服务业的发生比显著高于已婚者，又显著低于离婚丧偶者。受教育程度越高的流动人口越有可能从事服务业。在地区层面，人口规模越大的地区，流动人口越有可能从事服务业，地区生产总值和产业结构的影响则均不显著。

3. 社会网络对流动人口职业地位的影响

在职业地位模型中，社会网络的规模效应和质量效应同样呈现出相反的作用方向：在规模效应方面，社会网络的平均就业率对流动人口职业地位的影响显著为负。这可能是由于，对流动人口而言，追求较高的就业率通常意味着相对忽略职业地位的高低。当社会网络的就业率较高时，其就业的层次可能相对偏低，并对其中个体的职业地位产生负向影响。在质量效应方面，社会网络的平均职业地位越高，流动人口的职业地位也越高。这一结果支持了研究假设2，说明流动人口的就业状况与其所在的社会网络具有同质性。当网络总体的就业质量不高时，即便就业规模较大，也无助于提升流动人口的就业水平，而更高的网络就业质量则能帮助流动人口获得更好的职业。

从流入地就业市场的影响来看：城镇登记失业率对流动人口职业地位的影响并不显著，说明流入地的就业机会并不能决定流动人口的就业层次。劳动力从业结构的影响则显著为正，即流入地中从事第三产业的人员比例越高，流动人口也更易进入更高地位的职业。再次说明流动人口的就业状况服从于流入地就业布局。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影响表现为：来自城镇地区的流动人口比农村流动人口更可能从事更高地位的职业，流动范围越广的流动人口越不易从事更高地位的职业。

控制变量的作用表现为：在个体层面，男性流动人口从事更高地位职业的发生比显著低于女性，年龄对职业地位的影响并不显著，受教育年限越长的流动人口越可能从事更高地位的职业。已婚流动人口从事更高地位职业的发生比显著低于未婚者。在地区层面，人口规模越大的地区，流动人口越有可能从事更高地位的职业，地区生产总值的作用则显著为负，产业结构对流动人口职业地位的影响并不显著。

（三）社会网络影响流动人口就业的地区差异

为展示社会网络对流动人口就业的影响作用之地区差异，本文在上述分层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跨层交互项，表4展示了在表3模型基础上加入网络特征与流入地就业环境（城镇登记失业率、劳动力从业结构）交互项的结果。由于篇幅所限，表中仅展示交互项和主效应项的估计结果，不展示控制变量结果。

结果显示，在就业状态模型中，网络平均职业地位与流入地从业结构的交互项呈现出统计显著性，当流入地中从事第三产业的劳动力比例提高时，网络平均职业地位对流动人口就业状态的影响也显著增强，说明在第三产业就业更普遍的地区，网络质量效应对流动人口就业的带动性更强。

表 4 流动人口就业影响因素的跨层交互分析

变量	就业状态	行业类型	职业地位
层一:个体变量			
网络平均就业率	6.404*** (0.162)	-1.351*** (0.147)	-0.780*** (0.126)
网络平均职业地位	-0.081* (0.036)	0.807*** (0.032)	1.460*** (0.027)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层二:地区变量			
城镇登记失业率	0.043 (0.046)	0.107* (0.044)	0.185*** (0.036)
劳动力从业结构	-0.118 (0.078)	0.172* (0.083)	0.438*** (0.065)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跨层交互项:			
网络平均就业率×登记失业率	-0.091 (0.050)	0.120** (0.045)	0.000 (0.039)
网络平均就业率×从业结构	-0.058 (0.082)	0.081 (0.078)	0.051 (0.064)
网络平均职业地位×登记失业率	-0.001 (0.011)	-0.060*** (0.010)	-0.061*** (0.008)
网络平均职业地位×从业结构	0.049** (0.019)	-0.042* (0.019)	-0.141*** (0.015)
常数项	-4.051*** (0.172)	-1.035*** (0.167)	— —
个体样本	151005	121876	121876
地区数	289	289	289

在行业类型模型中，流入地登记失业率与网络平均就业率的交互项显著为正，而与网络平均职业地位的交互为负，说明在行业类型方面，社会网络的规模效应和质量效应均受流入地就业状况调节，并呈现相反的作用模式：当流入地的失业率上升时，规模效应对流动人口行业类型的影响会显著增强，而质量效应对行业类型的影响则会减弱。此外，网络平均职业地位与流入地从业结构的交互项显著为负，说明当流入地中从事第三产业的人员比例提高时，质量效应对流动人口进入第三产业的影响强度将会减弱。

在职业地位模型中，网络平均就业率与流入地就业环境的交互项均不显著，说明网络规模效应对流动人口职业地位的影响并不受流入地市场状况调节。网络平均职业地位与流入地登记失业率和人员从业结构的交互项均显著为负，说明在流入地登记失业率上升或从事第三产业的人员比例提升的情况下，网络质量效应对流动人口职业地位的正向影响均会显著减弱。

总结来看，社会网络对流动人口就业的质量效应和规模效应都因流入地就业环境影响而异。在失业率较高的地区，社会网络的质量效应对流动人口就业的影响显著减弱，而规模效应对流动人口行业类型的影响则会增强。在第三产业人员比例较高的地区，网络质量效应对流动人口就业状态的影响显著增强，但对行业类型和职业地位的影响都会显著减弱。

上述结果表明：一方面，社会网络的质量效应受到流入地就业环境制约。当流入地本地人的失业率提升或本地人已在第三产业中占据较高比例时，流动人口凭借社会网络谋求更优职业的可能性便会下降；只有在本地人的就业需求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后，社会网络对流动人口的就业效应才能更好地发挥。这说明在就业质量方面，流入地就业市场依然遵循着“本地优先”的原则，使外来的流动人口处于相对劣势，且难以凭借社会网络弥合这种差距。另一方面，相比于质量效应，社会网络的规模效应受流入地就业环境的制约相对较少，即：在不同地区，社会网络的规模效应都能发挥相对稳定的作用，但规模效应主要影响流动人口的就业状态而非就业水平。这说明在就业机会方面，流入地市场对外来流动人口是相对开放的，通过社会网络谋求职业成为其普遍且稳定的求职渠道，但当流动人口试图通过社会网络谋求更高地位的职业时，便会受到流入地市场的制约。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 2020 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微观数据及相关统计年鉴数据为基础，以流量流动人口为研究对象，就业状态、行业类型、职业地位作为流动人口就业状况三个测量维度，考察了社会网络对流动人口就业的影响。

（一）研究结论

（1）社会网络可以通过规模效应和质量效应两种途径影响流动人口的就业状况，且两种效应在不同就业维度上的作用方向存在差异。

（2）社会网络的规模效应表现为，社会网络的平均就业率越高，流动人口处于就业状态的发生比越高，从事服务业和更高地位职业的发生比越低。

（3）社会网络的质量效应表现为，社会网络的平均职业地位越高，流动人口从事服务业和更高地位职业的发生比越高。

（4）社会网络对流动人口就业的影响随流入地就业环境而异，质量效应比规模效应更受流入地市场环境制约。

（二）相关讨论

1. 重视社会网络对流动人口就业的双重效应及效应差异

中国传统的社会关系结构是费孝通先生笔下“犹如石头丢入水面所形成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一般”^{[50]28}，从自身向外扩散的差序格局。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的关系连结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在乡土社会中尤为明显。当以农村为主要来源地的流动人口决定外流时，最直接的选择便是沿着原有的亲属与同乡网络流出，并依靠网络在流入地立足。

鉴于“关系”在中国社会中的基础性作用，社会网络对流动人口就业的影响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已有研究从社会网络的规模、结构、关系强弱等角度考察社会网络对流动人口就业的影响，却鲜少讨论网络特征究竟如何作用于流动人口的就业状况。因此，本文聚焦社会网络的平均就业水平，从平均就业率和平均职业地位两个维度揭示了社会网络影响流动人口就业的路径，发现社会网络可以通过规模效应和质量效应影响流动人口就业，说明社会网络能够影响个体就业的关键在于网络成员处于特定的就业水平；在不同的就业水平之下，即便相似的网络结构也会带来不同的就业效应。这可能是已有研究在社会网络对流动人口就业的作用方向上存在争议的原因之一。因此，在考察社会网络对流动人口就业的影响时，不能仅关注网络的结构特征及流动人口与网络连结的紧密程度，更应重视社会网络的就业水平，并区分其不同的作用路径。

2. 关注宏观就业环境对网络就业效应的调节作用

个体禀赋与宏观环境是塑造就业的两个核心维度。已有研究或聚焦单一维度，或将其置于同一层级分析，本文利用分层广义线性模型，在检验了个体和地区两个层级变量对流动人口就业的影响后，还考察了宏观就业环境与个体社会网络的交互效应，即流入地就业环境对网络就业效应的调节作用。

流动人口同时嵌入在社会网络和流入地就业市场当中，其就业状况既受社会网络影响，亦被就业环境塑造，且社会网络作为一种非正式性就业资源，其对流动人口就业的作用范围和强度都会受流入地就业环境制约，而呈现出情境差异。本文发现，社会网络的规模效应和质量效应均受流入地就业环境影响，当流入地的失业率升高或从事第三产业的人员比例提高时，流动人口通过网络规模效应谋求职业的概率变化不大，但通过网络质量效应进入更优职业的可能性则显著降低，说明社会网络尽管在不同地区都能发挥就业桥梁作用，但在提升流动人口的就业质量方面则受各地就业市场环境制约。这也解释了为何已有研究关于社会网络对流动人口求职影响的结论相对一致，但在就业质量方面的结论却存在差异，其原因可能在于不同研究基于不同地区数据展开，而忽略了地区特征对网络效应的影响。因此，在考察社会网络对流动人口就业的影响时，必须关注宏观就业环境的调节效应。

3. 辩证地看待社会网络对流动人口就业的影响

鉴于社会网络影响流动人口就业的关键在于网络的平均就业水平，在讨论社会网络的就业效应时便不能笼统地判断是正向抑或负向。对此，本文认为社会网络对流动人口就业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社会网络的就业带动作用的确可以帮助个体快速在流入地立足，克服流入初期缺乏信息和机会的难题，但另一方面，当网络整体的就业层次较低时，也会制约个体就业水平的提升。因此，应当结合具体的网络就业状况，辩证看待其对流动人口就业的影响。对流动人口而言，在享受社会网络便利的同时，也应注意同质性网络所带来的就业束缚，这要求其尽快实现在流入地的社会融入，建立更高质量的异质性网络，打破原有网络的桎梏，寻求更多元的就业机会。

本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为了尽可能避免样本结构性偏差对统计分析结果的影响，本文选择了样本代表性强但变量相对有限的人口普查数据，导致对部分变量的测量存在局限：如对就业状况的测量未能包含工资水平、就业稳定性等就业质量指标；通过“来自同一省份或地市的老乡”界定的社会网络范围也相对宽泛。此外，本文所用的 2020 年普查数据正值“新冠肺炎疫情”流行时期，流动人口的正常就业受到疫情直接影响，因为数据并未涉及疫情前后的工作变化，导致难以评估疫情的影响效应。这些不足之处有待今后进一步完善。

[参考文献]

- [1] Liang Z, Li Z, Morooka H. Differential effect of migration networks: The case of China. *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2017, 3 (3): 354-378.
- [2] 周皓、刘文博：《中国省际流动人口流入地宏观选择机制的稳定性——兼论重力模型的理论扩展与实证检验》，《人口学刊》，2023 年 2 期。
- [3] 赵蒙成：《社会资本视角下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研究》，《中州学刊》，2016 年 2 期。
- [4] 周皓：《样本结构性偏差与因果推论——基于实验数据的分析》，《社会研究方法评论》，2023 年 2 期。
- [5] 王胜今、许世存：《吉林省流动人口的就业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 年 3 期。
- [6] 邱红、张凌云：《我国流动人口就业特征及分性别异质性研究》，《经济纵横》，2020 年 7 期。

- [7] 刘振、戚伟、刘盛和,等:《中国城市流动人口就业行业选择分异及影响因素》,《地理科学进展》,2023年6期。
- [8] 罗恩立、方丹丹:《家庭随迁、居留意愿与流动人口就业质量——基于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分析》,《人口与发展》,2020年3期。
- [9] 杨超、张征宇:《流动人口与本地人口就业质量差异研究:现状、来源与成因》,《财经研究》,2022年4期。
- [10] 张丽琼、朱宇、林李月:《家庭化流动对流动人口就业率和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及其性别差异——基于2013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分析》,《南方人口》,2017年2期。
- [11] 莫旋、周镭基、阳玉香:《分层异质视角下流动人口就业稳定性研究——基于分层非线性模型的实证分析》,《南方人口》,2018年6期。
- [12] 徐玮、杨云彦:《流动人口失业特征、分布及影响因素分析》,《人口与发展》,2016年4期。
- [13] 杨凡、杜姗姗、陶涛:《中国流动人口失业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基于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人口研究》,2018年4期。
- [14] 张新岭、赵永乐、林竹,等:《农民工就业: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耦合分析》,《农村经济》,2007年12期。
- [15] 沈诗杰:《东北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影响因素探析——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为中心》,《江海学刊》,2018年2期。
- [16] Liang Z. China's great migration and the prospects of a more integrated societ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16, 42: 451-71.
- [17] 王胜今、刘末:《受教育程度对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人口学刊》,2023年3期。
- [18] 任义科、王林、杜海峰:《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基于性别视角的分析》,《经济经纬》,2015年2期。
- [19] 刘玉、张雪:《基于行业特征的流动人口就业选择偏好分析——以北京为例》,《城市发展研究》,2021年3期。
- [20] 汪润泉、周德水:《农民工在城市间“用脚投票”能否实现高质量就业——基于流动人口监测调查数据的分析》,《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21年12期。
- [21] 张展新:《从城乡分割到区域分割——城市外来人口研究新视角》,《人口研究》,2007年6期。
- [22] Granovetter M S.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3, 78 (6): 1360-1380.
- [23] Putnam R D. The prosperous community: Social capital and public life. *American Prospect*, 1993, 13 (4): 35-42.
- [24] Lin N. Social networks and status attainment.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999, 25: 467-487.
- [25] Bian Y. Bringing strong ties back in: Indirect ties, network bridges, and job searches i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7, 62 (3): 366-385.
- [26] Massey D S.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immigration.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1990, 510 (1): 60-72.
- [27] Ahmad A. Connecting with work: The role of social networks in immigrants searching for jobs in Finland. *European Societies*, 2011, 13 (5): 687-712.
- [28] Patel K, Vella F. Immigrant network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occupational choice and wage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13, 95 (4): 1249-1277.
- [29] Waldinger R, Lichter M. *How the Other Half Works: Immigration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of Labo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 [30] Pfeffer M J, Parra P A. Strong ties, weak ties, and human capital: Latino immigrant employment outside the enclave. *Rural Sociology*, 2009, 74 (2): 241-269.
- [31] 钱芳、陈东有:《强关系型和弱关系型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甘肃社会科学》,2014年

- 1 期。
- [32] 朱明宝、杨云彦：《近年来农民工的就业结构及其变化趋势》，《人口研究》，2017 年 5 期。
- [33] Liang Z, Zhou B. The rise of market-based job search institutions and job niches for low-skilled Chinese immigrants. *RSF: The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Journal of the Social Sciences*, 2018, 4 (1): 78-95.
- [34] Liang Z, Li J, Glenn D, et al. From Chinatown to every town: New patterns of employment for low-skilled Chinese immigr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Social Forces*, 2018, 97 (2): 893-919.
- [35] Portes A, Sensenbrenner J. Embeddedness and immigration: Notes on the social determinants of economic ac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3, 98 (6): 1320-1350.
- [36] Waldinger R. The making of an immigrant nich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1994, 28 (1): 3-30.
- [37] Xie Y, Gough M. Ethnic enclaves and the earnings of immigrants. *Demography*, 2011, 48 (4): 1293-1315.
- [38] Hagan J M. Social networks, gender, and immigrant incorporation: Resources and constraint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8, 63 (1): 55-67.
- [39] 张春泥、谢宇：《同乡的力量：同乡聚集对农民工工资收入的影响》，《社会》，2013 年 1 期。
- [40] 王春超、周先波：《社会资本能影响农民工收入吗？——基于有序响应收入模型的估计和检验》，《管理世界》，2013 年 9 期。
- [41] 章元、陆铭：《社会网络是否有助于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水平？》，《管理世界》，2009 年 3 期。
- [42] 潘丽群、张少华：《社会网络能提高流动人口工资吗——基于路径及异质性的分析》，《广东财经大学学报》，2022 年 2 期。
- [43] 张昱、杨彩云：《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分析——基于上海市的调查数据》，《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 年 5 期。
- [44] Fan C C. Modeling interprovincial migration in China, 1985—2000.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2005, 46 (3): 165-184.
- [45] 周皓：《中国迁移流动人口的统计定义——人口普查视角下的分析》，《中国人口科学》，2022 年 3 期。
- [46] 周皓：《中国迁移流动人口统计口径比较》，《人口与经济》，2024 年 4 期。
- [47] Raudenbush S B, Anthony S.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s: Applications and Data Analysis Methods*. Thousand Oaks, London,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2002.
- [48] 杨云彦、陈金永、刘塔：《中国人口迁移：多区域模型及实证分析》，《中国人口科学》，1999 年 4 期。
- [49] Shen J. Explaining interregional migration changes in China, 1985—2000, using a decomposition approach. *Regional Studies*, 2015, 49 (7): 1176-1192.
- [50]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年。

[责任编辑：沈诗杰]

Keyword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effective history; ecological philosophy;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e Stance and Dimensions of Chinese Explanation and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LÜ Ming-chen, CAO Yu-yao (216)

Abstract: Chinese teaching is the foundation and essence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should be based on the explan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The explanation of Chinese includes one stance—the Chinese verbal communication stance, and three dimensions: The communicative functional dimension, the lexical semantic dimension, and the discourse dimension. The Chinese communicative standpoint is the entrance and ultimate goal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The communicative function is the starting point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The semantic dimension of vocabulary is relate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semantic categories and is a prerequisite for achieving reference; The dimension of discourse is related to the genera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discourse to achieve communicative functions.

Keywords: Chinese explanation; stance and dimensions;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dentity Construction of Confucius Institutes in Overseas Media Discourse:
Analysis and Reflection Based on Mainstream News Reports in Spain**

LI Qiu-yang, CHEN Chen (225)

Abstract: Exploring the identity construction of Confucius Institutes in overseas media holds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ortance for effectively enhancing the brand influence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capabilities of Confucius Institutes. Based on cultural discourse theory and utilizing a self-built corpus,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how mainstream Spanish media construct the identity of Confucius Institutes, examines their cognitive frameworks and attitudinal tendencies, and reveals the intrinsic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identity construction of Confucius Institutes and the social,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texts of Spain. By reflecting on its limitations and proposing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this study provides a case reference for the identity construction of Confucius Institutes in other regions and countries. The study finds that Spanish mainstream media, centered around themes such as culture, education, economy, and politics, construct multiple identities for Confucius Institutes beyond their foundational role as “language education institutions”. These include identities such as “cultural exchange envoys”, “language product providers”, “language market competitors”, “promoters of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and “carriers of national soft power”. These identities highlight the positive contributions of Confucius Institutes in promoting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Spain, as well as their potential influenc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urther research reveals that, although the thematic diversity in Spanish mainstream media discourse is gradually increasing, issues related to localized development are absent. The discourse predominantly features a single subject, with weak representation of non-official voices. The underlying values of the discourse are lacking, and the concept of benign competition is not adequately emphasized. The unidirectional nature of the discourse and the absence of a two-way interactive construction mechanism hinder the public’s comprehensive and accurate understanding of Confucius Institutes.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it is essential to integrate consensus across various sectors and promote the relevance of Confucius Institutes to local livelihoods and national interests from a “holistic” perspective that emphasizes mutual learning and shared development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This will enhance local media’s recognition and attention to localized issues. Additionally, it is crucial to de-emphasize “official discourse” and highlight “non-official discourse”, encouraging multiple stakeholders of Confucius Institutes to actively “voice” their perspectives. Leveraging the essence of Chinese culture to empower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emphasizing ecological value through diverse collaborations, and showcasing the mutually beneficial image of Chinese language dissemination are also vital. Finally, promoting the synergy between “self-construction” and “external construction” will help build a “true, multidimensional, and comprehensive” identity for Confucius Institutes.

Keywords: international language dissemination institutions; Confucius institutes; identity construction; overseas media; Spain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Network on the Employment of Floating Population:
Dual Effects and Regional Differences Based on the Evidences from Native-Place Networks**

ZHOU Hao, LIU Wen-bo (242)

Abstract: Based on the micro data of the 7th National Population Census and the relevant statistical yearbooks, this paper uses the hierarchical generalized linear model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network on the employment of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its regional differenc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social network affects the employment status of floating population through scale effect and quality effect. The scale effect shows that the higher the average employment rate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the social network, the more likely they are to be employed and work in the secondary industry. The quality effect shows that the higher the average occupational status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the social network, the more likely they are to enter the tertiary industry and engage in occupations with higher status.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network on the employment of floating population varies according to the regional employment environment, and the quality effect is more strongly influenced by the employment environment. The article suggests that we should dialectically view the effect of social network on the employment of floating population, pay attention to its convenience, while recognizing both the facilitative role and constraint effect on the career development of floating population.

Keywords: floating population; employment status; quality of employment; social network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Urban and Rural Digital Governance: How Can Empowerment Become Disempowerment?

LIU Wei, WANG Bi-chen (259)

Abstract: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governance cannot be simply examined from the binary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ology and governance, but instead from the view of power hierarchy and vertical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upper and lower. It focuses on observing the experience and effect of both grass-roots staff at the bottom of th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and the majority of residents at the end of the governance chain engaging with digital governance, and analyzes how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governance produces a new form of governance structure and its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In the transformation practice of the grass-roots perspective, the digital-enabled insigh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digital simplifying governance, and digital mapping reality are the practical forms of urban and rural governance digitization. However those digital-empowered practices, somehow, generate some unintended disempowerment effects. The suspension and compression of residents' autonomous space brought by digital targeting, the passive capture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power caused by digital dependency, and the idleness and involution of urban and rural governance process caused by digital display.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re-examine the boundaries of digital governance, shift from the obsession with intelligent governance to the exploration of governance wisdom, and strive for localized innovation with digital empowerment.

Keywords: urban and rural governanc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empowerment; disempowerment; localized innovation

Global Migration Governance: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Current Dilemma and China's Pathways

DUAN Zhuo-ting (272)

Abstract: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has evolved from a traditional issue of national governance to a critical international agenda concerning glob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owever, the current global migration governance system faces multiple systemic challenges; 1) the growing contradiction between sovereign states' governance logic and the demand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2) the fragmentation of governance mechanisms blurring boundaries of responsibilities among governance actors; 3) the unbalanced interests among nations hindering collective action; 4) the refugee protection mechanisms lagging behind actual needs; 5) the intertwined traditional and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threats. China has been actively exploring innovative governance approaches. Conceptually, it advocates sovereign coordination and shared responsibility, promoting a shift from internal control to open co-governance in migration governance. Institutionally, it is building a comprehensive governance system that coordinates domestic policies with international norms. China also employs a development-oriented incentive model to foster posi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migr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Meanwhile China promotes reforms in refugee governance mechanisms with broader protection. It also establishes a multidimensional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framework. These Chinese approaches not only enhance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but also provide important practical models for transforming the global migration governance system toward greater fairness and inclusiveness, aligning with the evolving demands of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reform.

Keywords: global migration governance; national security; global responsibility; development-oriented security concept